虚构亦真实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历史书写策略

张姣姣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虚构叙事中融入了维多利亚时期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文本的历史书写特色从以下 3 个方面得以呈现：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托，通过准确的地点与时间、巧妙的细节和关键词“时代”的多次重复呼应“大写的历史”；聚焦于“小写的、复数的历史”之中的普通人，通过冷门资料厚描法展现个体人物，尤其是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状态；在虚实交织中，通过“跨界”叙事对资本剥削、人物迂腐思想及“机器”般的整个时代进行反思，对传统全知全能叙事、传统单一结局进行反抗，呈现出鲜明的反传统写作特点。

关键词：约翰·罗伯特·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新历史主义；跨界叙事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5)02－0157－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1029525

Fictionalizing Historical Truth
—On History Writing Strategy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Zhang Jiaoji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John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ccommodates real historical characters and events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in a fictional narra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re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novel is based on real history, echoing “History” through accurate places and time, ingenious details, and the repeated repetition of the keyword “era”;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ordinary people in the “histories” and shows the lif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especially women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through the thick description of unknown materials; In the interweaving of reality and fiction, the novel reflects on the exploitation of capital, the pedantic thinking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machine-like” era through intrusive narration, and rebels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omniscient narrative and the traditional single ending, present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nti-traditional writing.

Keywords: John Robert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New Historicism; intrusive narration

收稿日期：2022－10－29
作者简介：张姣姣，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mail：1749641373@qq.com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罗伯特·福尔斯（John Robert Fowles）的长篇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凭借独具匠心的叙述策略、饱满丰富的人物刻画、引人深思的主题入选《时代》周刊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国际笔会银笔奖、W. H. 史密斯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并被英美各大院校文学课选为指定教材和必读书籍。“福尔斯在继承和吸纳传统的基础上，试图创作一部真正的‘冲突’小说；同时他又在自己虚构的领空中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实验。”[1] 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进行惟妙惟肖的戏仿，重现“大写的历史”；通过关注普通人的遭遇与命运，建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通过书写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借叙述者之口表明自己的观点，进行“跨界”叙事。此类大胆的实验性创新令这部小说突破了传统写作的边界。本文以《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历史书写为研究对象，探讨作家如何在小说中书写真实的历史事件，表现宏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在虚实交织中，呈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思与抵抗。

一、历史书写的三重结构

国内外对福尔斯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迄今，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研究涉及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多个视角。就新历史主义而言，已有多位批评家撰文讨论。国外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历史写作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研究重点主要为新旧历史主义争辩，例如：瓦尔特·艾伦提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旧式的历史小说”[2]；弗雷德里克·霍姆斯则认为，“这是一部非传统的历史小说，它带来了一种明确的现代作者意识来承载过去”[3]。国外研究后期更加关注小说的后现代性、元小说等元素，例如加拿大最受尊敬的理论家之一琳达·哈琴认为这部小说“对历史和虚构深刻清醒的认识为重新认识和思考过去的形式和内容奠定了基础”[4]。国内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历史写作研究主要围绕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进行多重视角的研究，例如：李丹指出了福尔斯创作中的社会权力话语的运作和意识形态对话[5]；王珏从叙事方式、历史书写与话语权、文学重构 3 个方面分析文本，揭示了潜藏在小说深层结构中的后现代历史观[6]；袁清等探讨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历史语境下主人公做出的种种选择，并分析其进步性和局限性[7]。

本文在结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文本的历史书写策略进行详细分析。小说的历史书写可以分为三重循序渐进的结构。首先，福尔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托，通过准确的时间与地点、巧妙的时代细节和文本关键词“时代”的多次重复来呼应“大写的历史”，复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环境。在“大写的历史”背景之下，福尔斯聚焦于一段段冷门资料中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群体在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遭遇和命运。他笔下的弱势群体遭受了时代的压迫和打击，在维多利亚的时代潮流中或随波逐流，或逆流前行。“大写的历史”与“小写的、复数的历史”相互碰撞，迸发出激烈的火花。小说将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故事与 20 世纪的作家阅历并置，在“跨界”叙事中对资本剥削、人物落后思想及整个“机器”般的时代进行反思，对传统全知全能叙事、传统单一结局进行反抗。《法国中尉的女人》不仅回应了为人熟知的“大写的历史”，而且构建了冷门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在虚实交织的叙事中揭露了时代的矛盾、陋习，展现了鲜明的反传统写作风格。

二、维多利亚时期：回应“大写的历史”

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使用“黄金时代”一词形容 1837 至 1901 年的英国：机器制造业的兴盛，自由贸易的繁荣，农业彻底摆脱“饥饿的 40 年代”。这一时期的英国似乎实现了千禧盛世的愿景，这一为人熟知的维多利亚黄金时期便是“大写的历史”。福尔斯在小说中利用准确的地点与时间、巧妙的细节和多次重复的关键词“时代”来回应“大写的历史”，复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图景。

福尔斯在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书写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准确的地点与时间，福尔斯将小说内容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小说开篇详细介绍了故事的发生地莱姆里季斯小镇：16 世纪的英国船队曾从这里出发迎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在此发现第一具鱼龙化石，使这里成为著名的化石小镇。小说女

主人公萨拉经常伫立的地方科布堤、散步的地方韦尔康芒斯在如今的地图上依然有迹可循，其中对“科布堤”地理方位、历史事件及周边景色的描写具体详实，意在表明故事发生地点的真实性。另外，标志性时间“一八六七年三月下旬的一个上午”[8]1 透露了当时处于维多利亚黄金时期；“一八六七年三月——仅仅六个月之后，《资本论》第一卷就在汉堡出版了”[8]11，福尔斯将男主人公邂逅萨拉的这一天设置为 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行的 6 个月前，透露出这个时期正是劳工阶级的意识觉醒期；查尔斯聆听未婚妻朗读《加利耶夫人》百无聊赖的那个夜晚“一八六七年四月六日”[8]114，时值 1867 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议赋予女性平等的选举权。准确的地点与时间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为小说增添了浓重的历史色彩，表明叙述者将历史融入小说，用小说表达历史的深刻用意。

显然，作家在构思小说时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首先，作品通过巧妙的细节将真实的历史融入虚构的小说，实现某种历史写作。“《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历史小说：它的背景是 1867 年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格兰，充满了时代的细节。”[9]《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章节引文、题外话、华丽的文风和悠闲的行文节奏都表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富于装饰性的特点。全书 61 章中的章节引文中，出现丁尼生 19 次，哈代 9 次，AH 克勒夫 8 次。这些著名作家作品的引用为小说人物提供了生动的社会生活背景。其中发表于 1856 年的《物种起源》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包括小说人物的谈话、叙述者写作的题外话等。在第 2 章中，查尔斯自述其与弗里曼先生为达尔文的观点而争辩，引得后者大发雷霆。因此，第 19 章查尔斯与格罗根医生饮酒时刻意用“小子”来描述达尔文。这一幕深刻地再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在传统维多利亚社会遭到的嘲笑与质疑。“除了卡尔·马克思与达尔文，没有一个 19 世纪的思想家的影响力能够延续到 21 世纪。”[10] 进化论击碎了上帝造人的宗教根基，信仰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革新了对人的本质的认知。《物种起源》的引用既是对小说中人物反叛性格及行为的暗示，又是一种对新旧更替的历史环境和氛围的烘托。

其次，关键词“时代”的多次重复也凸显了维多利亚的时代印记。福尔斯在小说中多次提及“在他们那个时代”“在她那个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等等，意在直指维多利亚时期特有的历史特征。第 2 章查尔斯·史密森与萨拉·伍德拉夫初遇时的描写：“她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他所预料的。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最讨人喜欢的女性形象是庄重、顺从、羞涩。”[8]8 第 3 章中人们认为查尔斯在国外旅游之后“一本正经神态（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冠之以庄重、道德纯正、诚实等上千个误导人的名称）有所减少”[8]15。时代冠之的“淑女”“绅士”的定义禁锢着众人的思想，令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深陷无形的囹圄。

在书写历史时，福尔斯几乎完全以真实史料为依据。但是，他书写的历史经过了小说人物意识与行动的过滤，表现的是宏大历史下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命运。换言之，作家更加关注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物个体的命运。

三、大时代下的人物命运：“小写的、复数的历史”

“时代”这一名义是集体命运对个人历史的吞噬，许多构成这个时代的人无名无姓，甚至从未存在过。这些未能得到浓墨重彩描绘的人物，命运却不尽相同，他们在层层叠叠相互交织中构成了鲜为人知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小说通过冷门资料厚描法展现个体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运，重构冷门却又真实的历史。

真正的作家应当“成为一张善于感知的薄膜，能够真实地复原那些无名的故事和无名的生命，能够揭示他们全部的意义，能够保存记忆”[11]。《法国中尉的女人》开篇第 1 章不提任何人名，而是用“一对男女”“另一个人”等词语来描绘主人公，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意在突出宏大话语对个人历史的吞噬。“为了恢复历史语境，新历史主义采用厚描法。他们认为，经过别人叙述的历史是不太可靠的。而要恢复历史的全貌，他们转向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档案材料，从轶闻、方志、日记等历史文本中去找第一手材料，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叙述历史。”[12] 福尔斯运用引文展现了各种冷门资料，如《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人文资料》[8]4,17,305、《城市医药报告》[8]136、《矿区报告》[8]106、《儿童雇佣委员会报告》[8]272

等，采用新历史主义厚描法，竭力通过边缘化的历史为读者展现维多利亚时代个体人物的命运。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有 3 种类型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不同阶层的面貌。男主人公查尔斯是贵族的代表，他身上有一种绅士责任、贵族情感。在温斯亚特庄园，查尔斯尤其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必须对这片土地负责，而这片土地所享有的名誉，以及几个世纪来形成的体制都属于他。”[8]198 弗里曼家族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崇尚社会地位，唯利是图，精明圆滑，却凭借商业改变了时代的发展进程，“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287。女主人公萨拉则是劳工阶层的代表，她既是受剥削的下层阶级，又是社会中处处受到压迫的女性。

在福尔斯的历史书写中，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迫害表现为压迫、束缚。首先是小说文本中出现的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英国古生物学者玛丽·安宁。1881 年，玛丽·安宁于莱姆里季斯小镇发现了史上第一具完整的鱼龙化石，在当地却没有任何一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模式标本。小说叙述者表示这是“英国古生物学界一个微不足道的耻辱”[8]45。这位非同凡响的女性为古生物学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在维多利亚时代显得微不足道、无人纪念，没有得到同时代人们应有的尊重。除此之外，福尔斯描写小说中女性的婚姻时反复提及“交易”一词。查尔斯向欧内斯蒂娜求婚后，弗里曼先生“仿佛达成了一笔绝妙的交易”[8]82；得知其无法继承庄园及爵位时，弗里曼先生则感到在“大笔交易中被击败，眼下这笔交易毕竟关系到他最钟爱的东西”[8]289。“东西”意指蒂娜，对于父亲来说，女儿只是一件可以交易而获得好处的物品。罗伯特爵士同汤姆金斯太太结婚，对查尔斯沾沾自喜地说起自己花极低的价钱买了传种母马，“在他的头脑中，显然是把这匹母马和他刚得到的另一样东西等同起来了”[8]219，这匹上好的母马暗指他求娶的妻子。女性的婚姻被描述为一场交易，交易的受益方是男性。纵使那人是自己的父亲、丈夫，女性仍像物品一样在男性间被交换。“十九世纪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候妇女是神圣的，然而，你花几个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8]272 小说文本处处彰显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这是时代真相的一部分，而这些场景又常常被掩盖，在“大写的历史”中看不到她们的影子。

在小说中，福尔斯秉持“真相不应被遗忘”的态度进行创作。第 13 章，叙述者说道：“你甚至认为自己的过去都不是十分真实。你给它添枝加叶，给它镀金或给它抹黑，进行删节，把它修补……我们全都在逃脱真实的现实。这就是人的基本定义。”[8]90 当历史事实不利于人们本身时，人们会不可避免地逃避、忽视、修补，以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于是成就了人们头脑中的历史。高继海认为：“历史知识满足某种感情需要，历史学满足于对身份的确认，因此历史叙事必然把史学家的意向投射到过去。历史叙事中的人物，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不过是叙事主体的镜像投射。”[13] 每个人都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历史，就算处于历史之中，人们对待历史的看法也经过了客观所受的教育以及前人思想的影响和主观思想的过滤。琳达·哈琴认为：“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只能来自各种被阐释和编织过的‘文本化的残余’——文献、档案证物、目击证据等。”[4] 因此，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利用冷门资料对历史进行质疑和改造，利用巧妙的写作技巧深刻揭露时代的真相。福尔斯的作品与历史记载的差异使得历史的主观性与文本性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书写的事件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形象。在约翰·福尔斯笔下，维多利亚时代不是女王统治下的太平盛世，而是萦绕着专制、压迫、麻木社会氛围的“机器”。但在作家看来，压迫者同样是受害者，所有人的生存“永远被绞在同一部可怕的机器里”。“历史、宗教、责任、社会地位等一切五彩斑斓的屏幕，都是人为树立起来的，目的是掩盖现实。”[8]208 时代使人们变成机械，丧失人性。作者身处 20 世纪，用现代性眼光审视 19 世纪故事的发展，深刻反思时代的缺陷，利用写作进行抵抗与创新。

四、虚实交织中的反思与抵抗

小说以文本为虚，以历史资料为实，作家在虚实交织中反思与抵抗。其中，反思体现在 3 个方面：小说将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故事与 20 世纪的作家阅历并置，叙述者介入故事的发展，通过对弗里曼家族的描述表达了对资本剥削的反

思；对女性选举权改革的描述又表现了对人物落后、迂腐思想的反思；“机器”一词的多次出现表现了叙述者及小说人物对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反思。反抗体现在两个方面：叙述者闯入故事，越过小说与读者的边界，直接与读者对话，对传统叙事进行反抗；多结局的小说结尾既表现了对人物角色自由意识的尊重，又反映了小说对刻板单一结局的反抗。

繁华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究竟有何种缺陷？叙述者在本该描写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语境的文本中多次提到 20 世纪的观点，将过去与现在并置比较，以现代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剥削与压迫。首先，叙述者通过对弗里曼家族的描述表达了对资本剥削的反思。小说中的弗里曼先生是成功的商人，“以一八六七年的标准看，弗里曼先生的企业已属十分先进，堪称同业之模范”[8]288，叙述者却“跨界”描述道：“用我们现在的标准衡量，他的学徒、见习生等人员，其居住条件极为恶劣，所受的剥削极为残酷。”[8]288 在 20 世纪的社会，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的见解深入人心，而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却无法在剥削与压迫中觉醒、抗争。虽然故事发生在 1867 年，但叙述者的叙事来自 1969 年的观点和知识。

除此之外，叙述者对女性选举权改革的描述表达了对人物迂腐思想的反思。小说中的多数人物角色麻木顺从，甚至迎合陈规陋习。1867 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中，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的提议引来众人的争相嘲笑。《笨拙》周刊刊登了“一幅开玩笑性质的漫画，画的是一群绅士把一名内阁女部长团团围住”，“多数受过教育的可悲女性则以皱眉表示不赞同，她们认为，妇女发挥作用的最佳场所在家里”[8]114。小说这一段描写了面对女性权利被剥夺，大多数人甚至女性自身皆有的麻木、嘲讽的反应。

叙述者借查尔斯·史密森之口对整个时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它令人窒息的礼仪，以及它不仅崇拜运输和制造业中的机器，而且还崇拜在社会习俗方面正在形成的可怕得多的‘机器’。”[8]150“那个时代的喧嚣的生活、严酷的现实和僵硬的社会习俗、被压抑的感情和浅薄的幽默、谨慎的科学和不谨慎的宗教、腐败的政治和不可改变的等级制度。”[8]373查尔斯对未婚妻的看法是“女机器人”，对时代的看法是“一架机器”，而接受固定命运的自己“简直就是化石”[8]373。“机器”一词的多次出现同样表现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社会、命运的顺从。

如何抵抗虚伪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常常从新的视角来对史实间的等级秩序、因果关系等进行阐释，以建构全新的历史版本，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进行质疑，并通过元小说的自我揭底，向读者揭露出不同的历史版本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的真相。”[4] 首先，《法国中尉的女人》通过“跨界”旁白颠覆传统全知全能叙事。传统维多利亚小说中，人物的一切命运尽在叙述者的掌握之中。《法国中尉的女人》与此相悖，叙述者闯入故事，越过小说与读者的边界直接与读者对话，进行“跨界”叙事。叙述者道：“我们希望创造出尽可能真实的世界，但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世界，也不是过去的现实生活中曾经存在的那个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一部机器。我们还知道一个真诚创造出来的世界，应该是独立于其创造者之外的。”[8]88小说对查尔斯的人物塑造严格遵循这一观点。小说人物查尔斯在故事中有自己的思想与灵魂，在梦到自己背负起责任与蒂娜完婚后，“他似乎认为，这本写他的事情的书将以一个显然是很糟糕的结尾而告终”[8]349。他甚至对叙述者也颇有微词：“我突然发现查尔斯已经睁开了眼睛，正望着我。此时他眼里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讨厌，他认为我若不是赌棍就是精神错乱。”[8]419 这种大胆创新的描写方式令读者惊奇，也使得叙述者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还成为故事的见证者、参与者。

对于小说的结局，作家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允许开放式的、不确定的结尾”[8]418。小说设计 3 种不同的结局表现了对传统单一结局的反抗。第 44 章是彻头彻尾的维多利亚式传统结局，是基于小说体裁与基调的适当的结尾。查尔斯与蒂娜完婚，成就了传统维多利亚式贵族绅士与淑女的“完美婚姻”。小说却在后一章毫不留情地揭示这是查尔斯的梦境与想象，更是自嘲“作者的写作活力行将枯竭”[8]349。后两个结局叙述者描述为是自己面临的两难选择，最终他决定“同时支持双方的立场”“我若不参与到冲突之中，唯一的办法是把两种结局都写出来”[8]418。于是在第 60 章，查尔斯在两年后找到了萨拉，两人重归于好。这一结局满足了查尔斯的罗曼蒂克式

想象，但并不符合拥有自由意志的萨拉的角色性格。在第 61 章，查尔斯在找到萨拉后，萨拉更向往自由，两人不欢而散。“小说的最后一个结局中，莎拉以告别查尔斯的方式冲破了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男性拯救者/女性被拯救者、男性导师/女性追随者的等级关系的束缚，捍卫了自己的自由。”[14] 查尔斯也在第三个结局中走出了维多利亚社会，走进了 20 世纪的现实。

五、结语

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虚实交织的叙事中对传统的宏大叙事提出质疑，通过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并置深入剖析与反思资本剥削、人物迂腐落后的思想以及“机器”般的时代的缺陷。同时，小说利用“跨界”叙事反抗传统叙事，利用多种可能的结局反抗传统的单一结局，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大写的历史”背景下被掩埋的鲜活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

从“大历史”到“小历史”，《法国中尉的女人》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着重表现了时代的现实，关注普通人物尤其是女性群体的遭遇与命运，反映时代的矛盾、陋习，成为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真实写照。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进行大胆的实验性创新：戏仿维多利亚时代、将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时代并置、描写多结局的小说结尾以及“跨界”叙事等。这不仅回应了为人熟知的“大写的历史”，而且呈现了冷门的“小写的、复数的历史”，令文本在虚实交织中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历史写作的叙事特色，表达了对时代缺陷的深刻反思与抵抗。小说同时受到了普通读者和学院派批评家的高度赞扬。小说将通俗读物的趣味性与新历史主义的创新性结合到一起，既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故事，又深刻揭露了历史的虚构与现实问题。小说呈现了在宏大话语背后无数鲜活的思想被掩埋的故事，福尔斯通过重新演绎被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与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世界。

参考文献：

[1] 侯维瑞, 李维屏. 英国小说史(下册)[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2] ALLEN W. The achievement of John Fowles[J]. Encounter, 1970, 35: 64 − 67.

[3] HOLMES F M. The novel, illusion and reality: the paradox of omniscience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1981, 11(3): 184 − 198.

[4] HUTCHEON L.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88.

[5] 李丹. 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 32(2): 89 − 96.

[6] 王珏. 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看约翰·福尔斯的后现代历史观[J]. 外国语, 2008, 31(2): 77 − 84.

[7] 袁清, 金巍. 命运与选择——从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J]. 作家, 2012(24): 113 − 114.

[8] 约翰·福尔斯. 法国中尉的女人[M]. 陈安全,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

[9] MCSWEENEY K. Four Contemporary Novelists[M].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 本·威尔逊. 黄金时代: 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M]. 聂永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1] DE GAUDEMAR P A. Quelques jours en automne avec le Nobel Jean-Marie Le Clézio[EB/OL]. (2008-10-10)[2022-10-03]. https://www.nouvelobs.com/rue89/rue89-rue89-culture/20081010.RUE6187/quelques-jours-en-automne-avec-le-nobel-jeanmarie-le-clezio.html.

[12] 胡作友. 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1): 89 − 94.

[13] 高继海. 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6(1): 1 − 8.

[14] 陈榕. 莎拉是自由的吗?——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最后一个结尾[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3): 77 − 85.

（责编：朱渭波）